

晚清官書局

述論稿

邓文锋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煙霞草堂文集 卷九

家造學問為吾鄉振儒風敢不時時自勵而爭名好利
因循粗略以自負學憲哉故先知校書本意然後可
言校法

一嚴校勘知校書本意則校勘札記即各生之課程日
記也故寧詳毋略寧嚴毋寬寧泛博毋固陋校書之體
宜然即看書之法亦是如是不但經書本文須詳加考
覈即注疏所引各書亦須詳晰對勘一字一畫必求其
的確始則本書自相考證又與他書對勘必使一毫無
憾則刊出必為善本其人亦即為善讀書也學問功夫
不進益吾不信也

一六十二冊

一儲書籍校勘之善非彙集羣書勤為檢證不可今擬
核勘之人分居時敏齋日新齋及講堂後每校一書其
應緝檢之書分儲三處書院不足借於他處萬不能借
則三處輪流除課期外每處准六七日則人人能見又
借胡氏圖書集成一部共三百六十套卷帙太多一處
度裁檢閱不便擬分藏四處藏書之處置一空案凡有
查閱考證均自攜所校書前往不准借向私室每處各
派一人管理污損失遺惟該管理是問其有私書及自
行向外借得者不欲人看毋須強借
一程功課刻工四十八人每人每日約刻二百字則日刻

晚清官书局

晚清官书局 述论稿

邓文锋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官书局述论稿 / 邓文锋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68 - 2473 - 6

I. ①晚… II. ①邓…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 ①G23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248 号

责任编辑 / 游 翔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艺和天下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华正印刷厂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7.75

字 数 / 273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出版活动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系列出版活动的进行，传播了文化知识，推动了社会进步；同样，社会愈是发展，文化愈是繁荣，则出版活动愈是活跃。二者互为辅翼，共生共荣。

中国为文明古国，同时也是出版大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湮灭的古代文明，这同传统出版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载诸典册，昭示后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虽然封建王朝迭经更替，对峙和割据时有出现，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却始终始终是时代的主流。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出版业的丰功伟绩。

有清一代的出版业，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近现代出版业的开创者。在清前期，特别是康雍乾时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统治者揭橥“稽古右文”“振兴文教”，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修书活动。与此同时，私人刻书、坊肆刻书、书院刻书、寺观刻书，多元并举，蔚为大观。近代以来，中国出版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铅印、石印等先进印刷技术相继被采用，出版物种类日益增多，规模数量急剧扩大，出版结构不断优化，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出版业产生并发展壮大……种种变化，都标志着中国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如果说中国古代出版业基本上一脉相承，体现的是一种延续和积累；那么，近代出版业则表现为新旧交替，是一种嬗变和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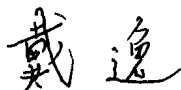
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晚清官书局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设置的一个专门出版机构，官书局不仅整理刻印了大量经史典籍，且以底本精良、雠校精审、售价低廉而深受士子欢迎，被学界誉为“局本”、“局刻本”或“官书局本”，流行海内外。更

可称述者，一批善本、孤本、稿本、抄本经此刊刻，遂使学者难得一睹的珍槧秘笈化身万千，流布人间。然而，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局限性，晚清官书局在出版思想、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出版机构，最终同整个封建制度一并衰落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之事物，成今日之历史；今日之事物，又将为明日之陈迹。如此，则过去、现在、未来皆可纳入历史研究之视野。我们研究晚清官书局，不仅仅要重现那个真实的、客观的、本来的历史事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官书局的研究，探讨出版特点，总结出版规律，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业提供经验和借鉴，进而从整体上预知更多未来发展趋势。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出版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专业。唯其新，方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后生可畏，来者难诬。”年轻一代学者，精力充沛，思维新颖，苟志于此，当有可为。

是为序。



2011年4月

晚清官书局
述论稿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近世图书出版特征	7
第一节 近代图书出版事业主题	8
第二节 出版机构多元化	15
第三节 机械印刷技术之传入	26
第四节 图书出版结构之变化	34
第五节 近代出版法令之制定	44
第二章 官书局之缘起	57
第一节 太平天国文化政策及战乱影响	57
第二节 清代官方刻书传统	63
第三节 对西学东渐之回应	68
第四节 从自行设局到奉旨设局	72
第三章 林林总总的官书局	80
第一节 官书局地域分布特点	80
第二节 书局与书院之关系	103
第三节 书局章程及人员构成	111
第四节 书局编校人员	119

第五节	书局经费之来源	134
第六节	曾国藩与金陵书局	141
第七节	张之洞与广雅书局	152
第四章	官书局业务研究	166
第一节	慎选底本	166
第二节	精审校勘	174
第三节	印刷技术之改进	184
第四节	局书的销售与发行	195
第五节	张文虎与金陵书局《史记》	203
第六节	俞樾与浙局《二十二子》	214
第七节	晚清官书局刻书特点	222
第五章	官书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38
第一节	官书局之衰落	238
第二节	官书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54
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76

绪 论

出版史属于文化史范畴，是文化史研究中的专门史。所谓出版史，是研究出版工作和出版事业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探讨出版规律的学科。

我国出版业发生甚早，最初的书籍，可上溯至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其后则有金文和石刻，至秦汉间，又有竹木、缣帛，竹木成简策，缣帛成卷轴。纸张和印刷术发明后，书籍渐变为册页形式，经千余年不断演变，才达到今日的形态。“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中华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①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延续并不断发展，正在于其典籍完备，自成体系。这同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

近代中国出版业，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一方面，古代中国出版业经过长期的延续和积累，至清代而达至极盛；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出版业相对稳定的状态被打破，表现为一种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在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和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图书种类日益增多、出版数量日益高涨、出版物新类型（杂志、报纸、教科书等）的诞生、新印刷技术（铅印、石印等等）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企业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图书史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②

一、为什么要研究晚清官书局

晚清官书局之大量出现，是近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自曾国藩首设金陵书局，各省即纷纷仿效，甚至如广西、云南等边远省份，亦相继奏请设局刊书，直接开创了清季官刻图书之中兴局面。

① 郑鹤声、郑鹤春撰：《中国文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② 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94页。

何谓官书局？简言之，官书局即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由清廷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督抚创办的官方专门图书出版机构。“书局”之名，最早出现于北宋，一般为编纂某书而设局，书成而撤局，仅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晚清官书局虽沿袭了“书局”之名，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改变。作为官方的一个专门图书出版机构，晚清官书局集编校、印刷、发售于一体，有着明确的刊书宗旨、具体的章程规定、固定的编校人员、稳定的经费筹措渠道和专门的售书机构，已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特征。

“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及至鼎革，摧残过半”^①，其间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借助于官方出版机构这一优势，晚清官书局在短短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刊刻了大量包括经史子集、学堂用书、时务新书在内的多种书籍，更有一批善本、孤本、稿本、抄本通过书局刊刻赖以留存，诚可谓成绩斐然。除了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和保存外，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图书馆事业建设、文化知识传播等方面，晚清官书局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欲把某一历史现象作为对象而加以研究，一定是基于某些困惑和疑虑。晚清官书局的出现，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序幕，而且还同外人出版机构、民间出版机构鼎足而三，共同推进了中国出版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官书局这一出版机构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多数出版史著作或对此视而不见，只字不提，或寥寥数笔，一带而过。有的研究者甚至对晚清官书局的刻书成就一笔抹杀，将之简单地归为清王朝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的“反攻倒算”，“为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封建专制服务”。此语虽云无误，但未免失之简单。

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晚清官书局刻书以底本精良、校讎审慎、售价低廉而著称，被学者盛誉为“局本”，流行海内外。然而，晚清官书局因何而兴起？书局由哪些人员组成？其刊书经费如何筹集？局书又如何销售？刊书有什么特点？因何而衰落？在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过程中，晚清官书局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对当代中国图书出版业有何借鉴？……这一系列的问题，学界至今尚无明确答

^① 朱士嘉编：《官书局书目汇编·引言》，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年。

案。因此，通过深入研究，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恢复晚清官书局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显得尤为重要。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或事物，其所蕴涵的内容和价值要远远超越其自身。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古今中外交会的十字路口，更是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晚清官书局之出现，不单单是近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其产生、发展、衰落的背后，则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从多个角度、以更广阔的视野，分析和探讨晚清官书局的兴衰成败，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这一出版机构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而且也将为整个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数典不可忘祖，继往方能开来。对晚清官书局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客观公正地评析其功过得失，对于我们做好当前的出版工作、把握出版规律、推进出版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资料整理及目前研究状况

出版史研究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我国古代出版业虽然发生甚早，“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①。相关资料的分散和不足，直接造成了目前出版史研究的困难。回顾近百年来的晚清官书局研究情况，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可视为官书局研究的萌芽期。

此一时期，有关官书局刻书的只言片语，仅散见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少数著作中。1930年，燕京大学的朱士嘉先生因研究需要，曾向当时各省图书馆或书局函索售书目录，成《官书局书目汇编》一书，是研究晚清官书局刻书的重要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各省官书局早于清末民初被裁撤或取消，有的成为图书馆之木印部或印行所，有的则归私人经营，仅靠刷印先前官书局所镂书版进行售卖。

在研究论文方面，最有价值的当推柳诒徵先生的《国学书局本末》一文（载《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刊》第三年刊，1930年）。柳氏本人

^①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胡道静序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曾于光绪末年在江楚编译书局任职达六年之久，1927年被聘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金陵书局、淮南书局和江楚编译书局所镂版片，均归该馆收藏）。在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柳氏对金陵书局、淮南书局、江楚编译书局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翔实的论述。此文虽属于个案分析，但却表明晚清官书局此一出版机构已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第二阶段：1949年至1979年，可视为官书局研究的形成期。

此一阶段的出版史研究成果，最可表述者为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编著的《中国书史简编》、《中国书籍史话》等几部书史著作。在《中国书史简编》中，作者对晚清官书局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些书局，由于出版了一些校刊相当精审的古书而在客观上起了保存和传播古代著作的一定作用，但在主观上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出现的，是政治上的反动企图。”^①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静庐先生对近代出版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先后选辑了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成为出版史研究的必备文献。在该套出版史料中，涉及晚清官书局的有数篇奏折和研究文章，如孙家鼐的《官书局开设缘由》、《官书局奏开办章程》、江梦梅的《前清学部编书状况》、净雨的《清代印刷史小纪》等。

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可视为官书局研究的发展期。

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硕果累累。学者通过搜集资料、拓宽研究领域，相继推出了一批出版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或利用某一章节对官书局进行整体概述，或侧重版本学，或侧重编辑史，或侧重印刷史，或侧重发行史，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晚清官书局的编辑、刻印和发行状况进行了论述和评价。

此一时期研究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多，质量显著提高，出现了梅宪华的《晚清的官书局》、《晚清官书局大事记略》，吴家驹的《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顾承甫的《清末官书局二三事》，孔毅的《清代官书局刻书述略》，张宗友的《试论晚清官书局的创立》，宗文的《晚清官书局的图书发行》等数篇重要论文，开启了晚清官书局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结构框架。与上述整体研究交相辉映的是，学者对各省官书局及所刻图书

^① 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第107~108页。

的个案研究也不断深入，若张惠民的《清末陕西著名的出版机构——味经官书局》、胡昭熔的《湖南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考辨》、江澄波的《晚清江苏的三大官书局》、李绪柏的《广东书局及其刻书》、叶农的《广雅书局始末及刻书考》、张其中的《四川官书局考略》等，皆为其中的佳作。这些个案研究文章，资料详尽丰富，分析鞭辟入里，论述切中肯綮，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晚清官书局研究的深入。

三、相关的研究方法

目前，在出版史研究方面有着两种思路：一种是粗线条的研究方法，即所谓“通史”、“简史”类，强调的是出版业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另一种是“专题性”的研究，即从编纂史、印刷史、发行史、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突出的是研究的专门性和“片面的深刻”。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前者往往流于空疏、宽泛，对许多问题语焉不详，持论模棱两可；后者则人为地划定门户，割裂原本为一个整体的事物，使得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考察晚清官书局，必须将其放置在近代中国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官方的一个图书出版机构，官书局固然是对古代中国官方刻书业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但其毕竟是在近代社会产生的，此一前提条件决定了官书局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近代出版业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图书结构的变化、先进印刷技术的采用等。可以这样说，晚清官书局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已具有了近代图书出版机构的基本特征，然而仍是很不健全、很不完善，体现了中国传统出版业向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业的过渡和转型，也集中展示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是进行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考证，既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基础，又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前提，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导出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史论，才可能使出版史著作，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①就目前晚清官书局研究的现状看，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基本

^① 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绪言》（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的资料整理，以致结论似是而非。现仅举一例，以见一斑：学者在论及金陵书局刻书字体时，皆批评其“刻字笔划和印刷手法过重”、“横轻竖重”、“过于拙笨”。而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刻印书籍之需要，也是曾国藩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曾氏本人刻书更喜宋体字，认为“画粗线粗，最为耐久”。后世学者不察，渐失刻书者之本意，乃至以讹传讹，积非成是。所幸的是，随着“硕宋楼陆氏藏晚清名人信札”等一批新资料的发现，学者必将会对晚清官书局的一些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同光年间，地方各省纷纷奏请设局刊书，几无省无之，但记录这些书局情况的资料却相对不足，散见于方志、个人文集以及官书局所刻书籍的序、跋、校勘记之中，非倾注全力、广搜博采不得一睹。为力求恢复晚清官书局的历史真实，本研究即使遇到极小之问题，也努力通过搜集直接资料或间接资料，进行考证和分析，以期从中求取合乎逻辑的实证性解释。为此，本研究将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其一，于具体中见整体，于微观中见宏观。从数量上看，晚清官书局计有四十余所，各局情况不一，通过具体分析各个书局的情况，综而合之，可以从整体上对晚清官书局有一个准确把握。同时，晚清官书局出现于近代社会，必须将其放置在此一时代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官书局的某些现象、事件和问题。如在论及官书局衰落原因时，既要考虑到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时又要考虑到此种衰落是同整个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衰落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二，以系统论方法，分析晚清官书局的结构和功能。一方面，同当时地方各省的众多局所一样，官书局首先是作为一个官方机构而存在的，通过分析其经费来源、人员构成、业务管理、图书销售等方面的情况，进而可以考察其整体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在晚清官书局的业务研究中，将会涉及许多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如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藏书史、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等，综合运用这些专业知识，全面分析晚清官书局的刻书特点，无疑将使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透彻。

第一章 近世图书出版特征

欲知一国之历史，必观其文化；欲明一国之文化，要在其图籍。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数千年间生生不息，其中，传统图书出版业对文化的保存延承、发展传播尤属功不可没。中国数千年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历久而不衰者，端赖乎此。

我国古代图籍最初是以甲骨、简帛等简单形式出现的，且为官府和上层社会所垄断。春秋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直接促进了先秦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至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贫寒士子得以通过借抄窥视天府秘笈，书籍流行渐积渐广。至五代时，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使大规模刊书成为可能，我国古代图书遂改变了先前抄本形式而步入刻本时期。经宋、元、明三代发展推进，各种典籍日臻完备，蔚为大观。正是借助于不断发展的出版业，我国古代文化得以积累、保存和传播。

清统一全国后，在文化上采取了一种“宽猛相济”的政策。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文化专制主义，迭兴文字狱，严禁反清思想言论和相关书籍的出版；另一方面，又每每揭橥“稽古右文”、“振兴文教”，提倡程朱理学，奖励著述，从意识形态上巩固王朝统治。此种文化背景下，有清一代之经籍编纂、刻印亦极盛一时，达至我国传统图书出版业的顶峰。据目录学家杨家骆统计：自西汉前起，至清末止，我国出版书籍总数为 181 755 部，236 万余卷，其中，清代即出书 126 649 部，计

170 万卷。^①无论是就部数还是卷数来看,清代出版的书籍均占据了我国古代图书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清代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坐集千古之智”,成为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总汇之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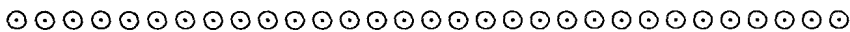
海禁大开之后,东西两种不同文明由于长期隔绝和骤然相遇而形成的激烈碰撞使中国蹒跚步入近代社会。对此,梁启超作出了极其精彩的描述和评论:

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韧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②

过渡时代,使近代中国处在古今、中西历史交会的十字路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前的传统社会形成巨大差异。因此,考察近代中国的图书出版特征,必须首先将其放置在这一巨大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

第一节 近代图书出版事业主题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交相入侵,传统中国开始走出封闭状态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业正是在这种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民族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与此一时代特征相呼应,近代中国图书出版活动始终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义,并成为反映国家和民族命运升降起浮的晴雨表,警醒世人,自立自强。



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古代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独立发展的,这与古代中国地处东亚大陆这一相对孤立、相对封闭的地

^① 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新中华》复刊第四卷第七期,1946年。

^②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

理环境不无关系。从地理背景分析入手，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比较孤立”，亦“比较特殊”：

但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绵延”。中国人的看法，人类历史的运行，不是一种变动，而是一种转化。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绵延。^①

正是在相对孤立、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历史观念和文化思想体系，并深深植根于它所独具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

在此种历史“转化”和“绵延”下，古代中国虽经历了众多令人目眩的王朝更替，但传统的封建社会模式却未根本改变。纵观近代以前的整个古代出版业，其所关注的内容也多是封建制度内部的阶级问题和社会矛盾，无论是“通经致用”还是“以史为鉴”，无论是“国计民生之学”还是“经济实用之书”，皆难出此大范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也逐渐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上升至首位。终整个中国近代史，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已成为时代主题，而近代图书出版活动无疑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昭示着近代中国前进的方向。

道光之世，封建王朝本身所固有的弊端日渐暴露，时人已将之视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②。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使得一部分思想敏锐、怀才蓄志的中下层士人警觉起来，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渐向复活，一种要求“自改革”的呼声应运而生。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魏源等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并于次年刊行。全书共一百二十卷，辑录了自顺治至道光初年官方簿务档册、官员奏疏、学者论著和书札中足备经济、关乎实用的文章，“志在措正施行”^③。数十年来，该书风行海内，被讲究经世致用者奉为主臬。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唤起了人们的隐忧意识，为万马齐喑的沉闷社会带来丝丝生机。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页。

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87页。

③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五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

与此种关注王朝社会内部矛盾相呼应，其时亦出现了数种专门介绍西方史地概况的书籍，而尤以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影响最大。此二种书均成于鸦片战争前的十年间，虽然多取材于古代中国种种史地之书，然表明先进中国人已开始将西方世界纳入自己的观察、思考视野。萧令裕甚至预言，英国侵略者“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①。种种议论有感而发，反映了他们对西方威胁的警觉和忧虑，也为此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次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终被西方列强的舰炮打开门户。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王朝更替不同，此一变迁可视为两种不同制度、绝异文化之间的全面遭遇与冲突，旷古未有。故时人多以“千古变局”形容此种变化之深刻：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②

处在“变局”中的国人因两次战败而产生巨大思想震惊，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觉醒，并开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数种记述战事经过的书籍便相继刊行，其中尤以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夏燮的《中西纪事》和梁廷枏的《夷氛闻记》最为知名。此类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期警醒世人。

与此同时，一批介绍西方史地的书籍也先后梓刻流行，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国人眼界大开，对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有了初步认识。此类书籍或取材于中国古史，或取材于异域之

^① 包世臣：《答萧枚生书》，《安吴四种》卷三十五，同治十一年刻本。

^②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